

荷马，才是我们忠诚的朋友

西尔万·泰松(法) 黄荭(译)

《与荷马共度一夏》是2017年夏天法国作家西尔万·泰松为法国国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录制的一档系列节目。作者说，这次录制“是一次在瀑布下荡漾心灵之旅，同样，也感受到在一首诗中让自己焕然一新的欢愉。几个月来，我都以荷马诗歌的节奏呼吸，聆听它的韵律，遐想着一场场战斗和出海远行。很快，《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让我活得更自在。而且，它们也照进了我们的现实……当代的所有事件都在史诗中找到回声，更确切地说，历史上的每一次动乱都印证了荷马史诗中的预言……在宙斯的天穹下，一切未曾改变：人还是老样子，是既伟大又令人绝望、光芒四射又内心卑微的动物……”节目内容汇编成《与荷马共度一夏》，中译本即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由“笔会”首发。

《伊利亚特》记叙了特洛伊战争，《奥德赛》讲述的则是奥德修斯重返他的伊萨卡王国的故事。前者描绘战争，后者描绘秩序的恢复，二者都勾画出人类境况的轮廓。在《伊利亚特》中，在诸神的操纵下，愤怒的人群涌向特洛伊。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从一个海岛到另一个海岛，想方设法脱身。两首诗反差巨大：一边是战争的不幸，另一边是海岛的机遇；一边是英雄的时代，另一边是内心的历险。

这些诗篇凝聚了两千五百年前，通过吟诵诗人之口，在迈锡尼王国和古希腊人民之中传颂的神话。这些神话在我们看来似乎很离奇，有时甚至骇人听闻，其中充满了丑陋的怪物、如死神一般美丽的女巫、溃败的军队、毫不妥协的朋友、献祭的妻子和狂怒的战士。风暴起，墙垣颓，众神云雨，王后啜泣，士兵用染血的衣衫擦拭泪痕，男人们互相厮杀。随后，充满温情的一幕中断了杀戮：爱抚终止了复仇。

让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将越过河流，穿过沙漠。我们将投身战斗，成为众神集会的座上宾。我们将经受狂风暴雨，身陷薄雾之中，深入密室，探访海岛，踏足暗礁。

有时，一些人被殴打致死，另一些则会得救。总有众神守护。总有太阳光芒万丈，照耀和悲剧交织在一起的美。人们为了各自的事情奔忙，然而，在每个人的背后，总有神在掌控游戏。人类能够自由选择或是只能服从命运？人类是一枚可悲的棋子抑或独立自主的造物？

岛屿、海角和王国组成了诗作的背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地理学家维克多·贝拉尔对此做出了十分精确的定位。地中海孕育了欧洲文明的源头之一，继承了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同时也是以耶路撒冷为代表的古希伯来文明。

这些从远古中浮现、在永恒中绽放的诗歌从何而来？为什么它们在我们耳边显得无比熟悉？如何解释一个两千五百年前的故事，依然焕发着熠熠如新的光芒，闪烁着地中海湾粼粼的波光，引起我们的共鸣？为什么这些青春不朽的诗句仍能为我们解开关于未来的谜题？为何这些神和英雄在我们眼中显得那么亲切？

诗歌中的英雄依然活在我们身上。他们的勇气让我们着迷，他们的激情是我们所熟悉的，他们的冒险经历造就了一些我们惯用的表达。他们是我们消散在悠长岁月中的兄弟姐妹：雅典娜、阿喀琉斯、埃阿斯、赫克托耳、奥德修斯和海伦！关于他们的史诗孕育了我们这些欧洲人：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想法。“希腊人让世界变得文明了”，夏多布里昂写道。之后，荷马继续帮助我们认识生活的真谛。

关于荷马存在之谜有两种假说。一是众神真的存在过，并给了诗人写他们生平事迹的灵感和先见之明。在时间的深渊里，荷马史诗具有预见性，注定要和我们的时代相遇。

二是在宙斯的阳光下，一切未曾改变，贯穿诗篇的主题——战争与荣耀、伟大与仁慈、恐惧与美丽、记忆与死亡——是它们让永恒回归的炽热炭火生生不息。

我相信人性不变。现代社会学家认为

为人类是可以不断完善的，进步和科学使人类变得更好。胡扯！荷马史诗是不朽的，因为即便人类外表变了，无论是在特洛伊平原上戴着头盔战斗或是正在二十一世纪等公交车，他们依然是同样的人，同样可悲或同样伟大，同样平庸或同样崇高。

还记得小时候被逼着读那些无聊冗长的课文吗？初中一年级时，课文中就有荷马史诗。那时的我们一心只想在林子里奔跑玩耍。我们百无聊赖，望着教室窗外的天空发呆，天上却从没出现过一辆神车。我们为什么无法让自己沉浸在一首经久不衰、依然生机勃勃、是最初也是永恒的诗篇之中？沉浸在一首众声喧哗、充满愤怒和训诫、有一种痛彻心扉的美、让诗人泪洒吟唱至今的歌词之中？

一个达达主义式的建议：放下那无关紧要的挂虑！把收拾碗碟的事放到明天！关掉电视和手机！让小孩子哭一会儿也没关系，别磨蹭，快打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高声诵读书里的章节，在海边也好，在卧室的窗前也好，在山顶也好。从心底吟唱出这超凡脱俗的诗歌吧。这些诗歌，对处在时代迷雾中的我们有所帮助。可怕的时代就要到来。以后，饱受工业污染的空中会升起一架架无人机，机器人会对我们进行生物识别。

未来，由互联网连接在一起的一百亿人类，会陷入对彼此无尽的猜疑中。跨国公司想靠基因手术牟利，鼓吹人类未来可以多活几十年。荷马，才是我们当今世界忠诚的老朋友，他能驱散后人文学的噩梦。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人应该在多姿多彩的世界中张扬自我，而不应该在一个宛若沧海一粟的星球上狂妄自大。

扮演者才是鞍山话剧团出身的陈晓旭，曲艺团才会出来一个著名的评书家刘兰芳。有了全国支援鞍钢，才有后来的鞍钢支援全国。凡有“钢”字的大型钢铁企业，如包钢、武钢、马钢(马鞍山)、兰钢、攀钢(攀枝花)、宝钢的技术骨干力量，起初都有鞍钢人，而我们的亲戚中有的也从鞍钢走向全国，就好像从东北伸出手臂去一样。这时我们家已经扎根在鞍山、沈阳，五代人构成大大小小十几个家庭；一部分后代能听懂上海话，满口讲的都是东北话；我母亲所做的拿手宁波菜、上海菜，被有的小辈继承。吃食与穿戴两项糕人的南北习惯，成了我们这个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家庭特色。

1978年我考上恢复高考之后的首届研究生，来到北京。毕业后留京工作，开始了家族部分成员向又一个地域的转移。在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挖掘了海派文学，触动了我对甬沪两地固有的“情结”，调动起童年的生活记忆，写出了最早的海派小说研究专著。我从学术上仿佛踏上了一条回归之路。改革开放的历程使得社会的物质、精神环境发生了大变化，与海外的亲友都建立起联系，不再隔绝了。上海、天津的堂弟堂妹多有下海经商成功者，我这里又分出新一脉，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人儿不断有考上北京学校而留京者，北京支脉有了雏形。

我们这个家，从甬入沪算起，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计30年；从上海到东北是1950年至1970年代末也是30年；再由1980年代至今整整40年；正逢一百年！这么长时段的家族变动，正好与现代上海的形成、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前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相符合。这种迁移，不仅没有使两地关系隔膜，反是加强。无论是物质往来，人才技术的交流，哪怕到了乙地再无机会返回甲地，也会在不绝的思念、回想中，向对方发出呼唤。如是再移至第三地、第四地呢，这种交流便乘N次方了。这便是一种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的日渐深厚的积累了。

亲曾多次问我，我们几时到的鞍山？我不假思索就说是4月4日，因为那天是旧的儿童节。一路上我父亲带的家人最多，行李最沉。圆形的装被子的帆布袋以外，还有瓷碗瓷碟的竹筐，是长期过日子的架势。但带了这么全的东西，在鞍山的第一冬天全家却没有棉鞋穿，我踏着跑鞋冻得如猫咬一般。在鞍山，父亲先在给水厂、后到三冶金属结构公司工作，他还被借调到抚顺、本溪、酒泉等地查账建账，由成本会计直做到会计师。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鞍钢建设三大工程为七高炉、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是恢复生产后的苏联援助项目。建后颁发纪念章，父亲也有一枚，后来我在鞍山和北京的徽章市场上都购到过，是早期参与鞍山建设的一个标志。鞍山外来的建设者越来越多，过去日本人留下的房子已不够用，开始大规模建造工人住宅，仅具备地板、双层窗、暖气、煤气标准的红楼在全市就有四处，我们家曾住过其中的两处。我觉得，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工业化意义重大，三大工程和红楼都是应当保存的文物。鞍山不忘外来援助人员的功绩，南方十几个省市的迁移者有一段时间均享受特殊的大米配给(每月三十斤粮食定量中大米可占十几斤，否则仅三斤)，在闹市区开设专卖南方产品的青年商店、南味商店，特别从上海整地地迁来国华照相馆、老正兴、熏腊店等。文艺单位从全国聘来好演员，所以鞍山的京剧团、话剧团、曲艺团的水平都不低，这样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里林黛玉的



脉(木刻)刘童成

百年翩跹

吴福辉

居住在东南沿海一带辛苦讨生活的百姓，自古就与广大内陆的“安土重迁”传统不同，他们喜迁移，或曰在大潮之下不拒漂泊和转徙。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分明，这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历史动力。

前几年，我这个小小吴姓支脉的家谱于无锡一个堂哥那儿被发现。这是个手抄本，由堂哥的祖父即我亲爷爷最小的一个弟弟——家人称“小阿爷”——用他漂亮的书法一字一字抄录的。本来各家各房皆存，但到后来就不知所踪了。可以想见，这硕果仅存的一册是如何宝贵了。我特意跑去无锡复印了，将它郑重捧回。

据家谱说，我们的根子是延陵(丹阳常州之间)，以后辗转至浙江四明之地等等。这中间我曾亲历过的大部已不可考。至于延陵，我与儿孙一行四人2000年的元旦曾去探访过，那里的地名至今仍叫一房村、二房村、三房村、四房村、五房村，原是春秋吴季札的封地。镇政府刚接待过台湾吴倩莲的秘书也姓吴，他说一村一村都姓这个，不姓吴姓啥？但是我在哪里找不到任何与我有关的遗存，我只能凭着想像，发思古之幽情。

而宁波就不一样了，它是我能见到祖屋的故乡呵。

宁波的创业中坚是我曾祖父。他独力在宁波城里闹市甘条桥的地方开设了古霞室装裱裱裱达四十余年，取得成功。由此完成了我家“弄文贾商”(家谱语)的转换。到了鼎盛时又在江北开了分店，由其长子即我祖父经营。于是再完成那时人们认可的大事，在镇海东管乡河里头，盖了本村第一幢二层楼，迁了祖坟。家谱中记下“时在民国元年”(即1912年)的准确时间。我写有《镇海老屋》一文，详述在当地政协搞文史工作的朋友协助下，2003年发现并认定祖屋的经过。这老屋即我父亲的出生地。甘条桥和河里头，我都不止一次地探访过，古霞室仅余遗址，老屋一百岁仍健在。

任何事情都有盛衰，民国以后被画业出现衰落，源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动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过去，江南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客堂，至少也要有一个中堂和对联，更不必说富人几进院落的匾额、楹联了，这都需裱过才能悬挂的。但这时现代习惯开始渗入，房屋的布置渐渐趋新，裱画业逐步压缩成艺术品位较高的“小众化”行当，大部分店铺都在一夜之间失掉了存身的基础。听长辈说，曾祖父也挣扎着想改营其他，比如古霞室自制账本，这账本能结到想任意抽出一页纸也不可的地步。不过这并不能挽回一切，终于使得曾祖父在眼见上海越发崛起的关键时刻(约上世纪二十年代)，毅然决定了五个儿子的去向：三阿爷一家留守，二阿爷、小阿爷转移无锡，我阿爷和四阿爷奔赴上海。我不知道那时开不开家庭会议，但我在整整一百年后的今天，还可以感受到这个决定的悲壮性质。

待我在黄浦江畔出生，家族的这次“大转移”已然完成。我从小的感觉，宁波人融入上海求得立足，就像从这个市区搬到那个市区那么熟悉、自然。不过我们长房有了新情况：我爷爷原来经亲友的介绍在一家工厂工作(我的二叔在蛋业工会任职是后来的事情)，却因“得了时疫”猝逝。其时，父亲高中未毕业，他面对家中的后母、一个同父同母的姐姐，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不得不辍学，去上海南市“学生意”(做簿记学徒)，开始了他的会计生涯。父亲在上海先后做过职员和商人。依我看，他在报关行(一种代商人办理报税手续的机构)任职算是顺风顺水。那时我家租住静安寺“上只角”的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四寿邨整幢石库门三层楼房，那里望得见张爱玲的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的窗户，背后就是她写得那样可爱的一路电车场，而我则进了新闻路西区小学读书(今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这是一个中产市民家庭的地位。不过后来他经商屡屡失手，收入下滑，我们搬去虹口，他饱尝了失业的痛苦才有了以后还他的决心。家里的叔叔叔娘没有读过名牌大学，却或多或少在上海都有了不同的高等教育经历。最成功的是大权学完“土木建筑”成了工程师。他最早开公司是在虹口四川北路丰乐里的家，狭小阴暗的弄堂，现在属于多伦多左翼文化纪念馆的一部分。后来他自己设计，包建筑队盖房子，成了气候之后甚至在施高塔路(即鲁迅大陆新村故居所在的山阴路)路底、当年的半城市土地村地段，建了一幢小洋楼，院里土场与虹口公园(老靶子场，今鲁迅公园)挨着，下了绳套竟能逮到獾子。这地方现今即欧阳路580号的朱妃瞻艺术馆。大叔可代表我们在上海已经立脚稳固，而我们家却是广大移居的宁波家庭的极小一分子。

“宁波人在上海”这个题目如今不用我来饶舌，宁波商帮有专门的研

笔会

日本东京以寺庙和神社之多闻名，但实地接触之后，这种“多”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想象。在东京街头漫步，走不多远，就能遇上一家或大或小的寺庙、神社，点缀于路边，成为街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或是画龙点睛之笔，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

东京的寺庙、神社之多，自古已然，日本唯美作家永井荷风在上个世纪初曾穿行于当时东京的大街小巷，记录下许多现已消失的、斑斓多姿的旧日风景、市井百态。他把这些记录结集为散文集《晴日木屐》，此作堪称神品，写得深幽隽永、从容闲散、妙趣丛生。

开篇作者即这样介绍自己：“个子比普通入高的我总是穿着晴日木屐拿着蝙蝠伞走路。无论是多么晴朗的天气，不穿晴日木屐拿着蝙蝠伞就无法安心。这是因为我对东京终年多雨的气候完全无法信任的缘故。世间善变的可不只有男人的心、秋日的天空和朝堂的政事。”

第二篇写的就是东京的“淫祠”，也就是非正式的、民间自发建起的小庙，类似于中国以前的野庙，永井对这些街头小庙可谓一往情深：“我喜欢淫祠。从小巷景色增添风趣这一点来说，淫祠的审美价值远在铜像之上。本所深川的堀侧桥边，麻布芝边的陡坡下，繁华街道的仓库之间，又或是有许多寺庙的巷角中，总是竖立着小小的祠神，还有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中的地藏菩萨，即使今天还会有人在上面挂上绘马

东京散记

耿传明

匾，放上供奉用的毛巾，或是点上线香。”永井欣赏古人这种带点原始色彩的认真和虔诚。因为在“这种既没有逻辑可言，又没有道理可辩的愚昧之中，仔细想来带着一种伤感，使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微妙心境。”

遥想百余年前的鲁迅，曾在东京街头徜徉，目光不时为这些大大小小、琳琅满目的寺庙所吸引，也因此会对精神与信仰的关联产生直观的了解。我曾和朋友寻访过鲁迅留在东京的唯一遗迹，他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公寓。这个公寓离东大不远，在他之前还被夏目漱石租住过，应该说是一个很有点故事的地方。不过很令人失望，我们从东大的那个古朴典雅的大红门“赤门”出来(此门来历非凡，原为加贺藩的御守殿门)，靠着手机导航，走了好一阵儿，才找到地方，但目的地竖立着一个公交车站式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夏目漱石·鲁迅旧居”，也就是

说经过一九二三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一九四五年的东京大轰炸，这所曾被鲁迅和同住者命名为“伍舍”的大房子已经走完整、住、坏、空的历程，尘归尘、土归土，复归于无了。

在寻找鲁迅故居的路途中，我们经过了一家面积不大，但颇为肃穆、雅静的寺院，院里有法相庄严的佛像、莲花、古松，浴佛的水槽和木制的百子，一切都那么光整有序、井井有条。寺庙里的僧人见了来人，并不迎接、过问，好像视而不见，仍在那里做自己的事情。日本的寺院里往往有大片的墓园。我曾对杂处于居民区的星罗棋布的墓园感到好奇，因为中国人对于死亡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往往把墓园建在人迹稀少之处，好像有意让大家把死亡这事忘掉，以免让其大煞风景。因此我对日本人敢于正视死亡的气概还是有几分佩服的，因此曾向一位熟悉的日本教授感叹：“贵国人的心可真大！居民区有这



江户川公园芭蕉庵的夜寒碑

么多墓园，大家都这么坦然地与鬼为邻，把死当成生的一部分接受下来，真是难得的豁达！”那位教授朋友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还好吧，日本人在这方面确实挺突出……不过靠近墓园的房子，价格还是会受影响的。”

我在东京经常去散步的地方还是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江户川公园和棒山庄等地。江户川公园有一个非常僻静而雅致的小庙——芭蕉庵，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庵位于江边，去那里要沿阶而下、穿过一条林间小径才能抵达，因此游客不多。庵中有庵舍、枫树、古松、池塘，硕大的锦鲤游弋水中，可谓悠游自在。庵中竖立的一块石碑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块碑名“夜寒碑”，刻着一首写于1753年的日本俳句，我请一位精通日文的朋友帮着翻译了一下：“两夜鸣啼一夜为寒冷的蟋蟀。”诗碑刻的是汉字，但已漫漶难识，开篇两句是“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无与异矣”，可视作对此俳句的点睛阐发，所谓两夜鸣啼，“一夜”是因为秋寒透骨而被冻醒的诗人，“一夜”是同样为秋寒所冻在林中哀哀鸣啼的蟋蟀；俳句把被夜寒冻醒的人和同样境遇中的蟋蟀并列连接起来，于是就达到了一种万物一体、同体大悲的悲悯之境，这也正是古人所言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人生三界。回程之中，拾阶而上，小径幽深、落叶纷飞、鸟鸣于山、鱼跃于水，此情此景、如此甜蜜又如此哀伤，令人想起小津安二郎说的一句话：“我讲的不是故事，我讲的是轮回和无常。”这大概比较接近于日本文学所特有的侘寂、幽玄之境了。借松尾芭蕉俳句结尾：“古池塘，青蛙跳入水中央，一声响。”